



中青年学者文库

费小平 ◎ 著

家园政治： 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2006年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四川外语学院2006年度校级科研重点项目

费小平 ◎ 著

家园政治：

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费小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未名·中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1-17796-9

I. ①家… II. ①费…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227 号

书 名: 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

著作责任者: 费小平 著

责任编辑: 季春莲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96-9/I·22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minyanyun@163.com

印刷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172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章 家园政治与后殖民小说	(1)
第一节 “家园政治”命题:线索清理与讨论	(1)
第二节 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文化研究	(25)
第二章 英国家园政治小说传统	(31)
第一节 发轫期:从丹尼尔·笛福到亨利·菲尔丁 笔下的家园:殖民扩张/充满冲突的场所	(31)
第二节 形成期:简·奥斯汀笔下的家园:充满冲突的 场所	(35)
第三节 成熟期:从威廉·萨克雷、查尔斯·狄更斯到 罗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的家园:完全的殖民 扩张/本土与异域之间的第三空间	(40)
第四节 高潮期: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家园:从海外 殖民到本土回望	(55)

第三章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家园：思念/迷失/拒斥/恐怖/ 批判/尴尬	(91)
第一节 迷失的家园：从张爱玲到白先勇	(92)
第二节 文化乡愁的家园：从於梨华到聂华苓	(102)
第三节 重建传统的家园：从汤婷婷说起	(118)
第四节 批判的家园：“文革”批判：从陈若曦到严歌苓、 严力、哈金	(132)
第五节 伍慧明的《骨》与伍邝琴的《裸体吃中餐》： 记忆的家园	(166)
参考文献	(173)
致 谢	(180)

第一章

家园政治与 后殖民小说

第一节 “家园政治”命题:线索清理与讨论

首先,我们务必明确一个前提:“家园政治”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地理学问题,因为文化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形、权力、表征三者之间的互动问题,而家园就属于“地形”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换言之,“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客体,而是一个通过“权力”,以一系列“表征”性符号为媒介通道所建构的“主体想象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家园建构都是“政治性的”(political)。它涉及身份、地点之间的基本联系和流动、变迁、变化之间形成的更为复

杂的关系。^①

“家园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命题之渊源可追溯至中世纪著名学院派神学家、神秘主义学派开创者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Victor 或 Hugh of Saint-Victor, 1096—1141)在《世俗百科》(*Didascalicon*, 1127)中的一段叙述:“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②这里的“家园”显然已不是情感意义上的家园,而是理性或哲学思考意义上的家园,指向“离乡背井”、“异乡”、“放逐”、“流亡”、“无家可归”等层面。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更加突显这些意义:“稚嫩的人把自己的爱固定在世界上的一个地点;茁壮的人把爱扩展到所有的地方;完美的人则使爱消逝殆尽。我从童年起就居住在外国土地上,明白告别农舍那微弱炉火时的悲痛心情,而且也知道,后来对那些大理石壁炉和镶嵌着面板的客厅,心里又是怎样不加掩饰地不屑一顾。”^③这位神学家还撰有《基督教奥义论》(*De Sacramentis Christianae*)、《格言集》(*Summa Sententiarum*)等著作。由神学家圣维克多的雨果开创的家园话语,走过了近800年的喑哑期后,进入现代,开始有较大进展。这似乎可以以20世纪初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论述为开端。

1.1 20世纪80年代前资源

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提出,“家园”有时与一种“暗恐”(unheimlich)密切相连,与一种“非家幻觉”密切相连——德语词“unheimlich”不仅可译作英文词“uncanny”(暗恐),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② 转引自[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1页。

③ 转引自[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1—12页。

也可译作英文词“*unhomely*”(非家幻觉)。^① 191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通过自己在马克斯·韦伯指导下完成的著作《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提出,“所有的小说都是患‘恋家症’的(*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②。小说建构了一个此岸世界,其中,“在彼岸世界之外,每一个迷途的漫游者都已经找到期待已久的家园;每个渐行渐弱的孤独之声都被一个聆听它的歌队所期待,被引向和谐,并因此成为和谐本身。……彼岸家园的每一个居民都来自于此岸世界,每一个人都因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与这个家园相连;但是,只要当每一个人的路已到了尽头,路也因此变得富有意义的时候,他才认得这个彼岸,才看见了它的脆弱和沉重”^③。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从哲理层面来看,这种“家园”是建构在“总体性”的向往之中的。现代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在30年代认为,“家”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与所有别的存在者都不同,因为他必须生存于世界之中,别的存在者则没有这种“必须”。^④ 即是说,人之为人,必得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存在或生存。但这种生存关系并不自在,它是人创造或认可的,人之为人亦非天生,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生成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都是某种生存关系中生成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都是某种生存关系史。^⑤ 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家”指“世界大厦”,这一“世界大厦”即天地人神的“四方关联体”,因此,“归家”就是回到天地人神的关联之中,回

① 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in 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1, pp. 929—952.

②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③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载《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

④ 参见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⑤ 同上书,第172页。

归到作为命运的“中间”(die Mitte)^①，而“这个中间之所以叫中间，是因为它起着中介作用：它既不是大地，也不是天空；既不是神，也不是人。……大地和天空、神和人的‘更为柔和的关系’可能成为更无限的。因为非片面的东西可能更纯粹地从那种亲密性中显露出来，而在这种亲密性中，所谓的四方得以相互保持”^②，促使“亲在”(Das Sein)走向“在”(Sein)。与此同时，1931—1979年期间，一批经典的民族主义文本对“家园”话语的构建做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贡献，如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1931)、《民族主义：一种宗教》(1960)，汉斯·科恩(Hans Kohn)的《民族主义：意义与历史》(1955)，埃里·凯杜里(Elia Kedourie)的《民族主义》(1961)，尼奥拉德·都伯(Leonard W. Doob)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论二者的心理学基础》(1964)，安东尼·D.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20世纪民族主义》(1979)等等。“民族主义运动”是其中的唯一意识形态框架，均将“空间”想象为“家园”，尽管“民族”等同于“家园”会招致几分“危险”。其中，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1971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中设置专章“瓦尔特·本雅明或怀旧”(“Walter Benjamin; or, Nostalgia”)来讨论“家园”：“从本雅明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忧郁——一个人的消沉、职业的挫折、局外人的沮丧、面临政治和历史梦魇的苦恼等等——便在过去之中搜索、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客体，某种象征或意象，如同在宗教冥想里那样，心灵能让自己向外凝视着它，在里面觅到短暂的、哪怕是审美的宽慰。……在我看来，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最好理解成一种讽喻的思想，一系列平行而不相连续的深思的层面……对于我来说，本雅明的著作仿佛镌刻着一种痛苦的勉强，他力图达至某种心灵的整体性或经验的统一性，而历史境况却处处

①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载《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0页。

② 参见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都有可能把这种整体性或统一性粉碎。”^①这里,家园=忧郁=个人的消沉、职业的挫折、局外人的沮丧、面临政治和梦魇的苦恼=过去=心灵=审美的宽慰=痛苦=心灵的整体性或经验的统一性被粉碎。1978年,当代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批评家萨义德在丰碑式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中首先将家园话语推向了批评层面:“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平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②这明显地复写了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家园话语。即是说,在萨义德的心中,家乡可泛指世界,世界是一个大的家园,只有在这样的宽阔胸怀中,在“流放”与“放逐”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小家(民族/国家)心理的狭隘。^③它指向“东方学”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直接回应的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自我扩张的、非道德的、具有技术专门化倾向的人文文化……所构成的威胁”^④。

1.2 20世纪80年代资源

法国当代学术界一代宗师米歇尔·福柯于1982年提出了“空间—知识—权力”模式^⑤:在这里,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为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福柯如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

①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

②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1—332页。

③ 石海峻:“地域文化与想象的家园——兼谈印度现当代文学与印度侨民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0页。

⑤ 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① 这首次将“空间”问题推向后现代层面即所谓“后”学层面,“家园”问题也随之进入所谓“后”学层面。戈温德林·莱特(Gwendolyn Wright)、保罗·雷比诺(Paul Rabinow)等学者于同一时间也提出“权力的空间化”命题。^② 他们在充分引述福柯的话语之后,明确提出:“在现代的权力形式下,空间的中心性……可能更具关键性。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此两词都是复数)——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它包括在机构(制度)建筑中的教室和医院的设计,以及其中的种种经济与政治的安排”。^③ 1982年,艾芙琳·托顿·贝克(Evelyn Forton Beck)编辑相关论文集《可爱的犹太女孩们》(*Nice Jewish Girls*, repr., Boston: Beacon Press),标志着对“家园”(home)/“家庭生活”(domesticity)所进行的首次学理化尝试。1983年,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推出《民族与民族主义》(*A Typology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指出:“可以本着一种伦理的、‘普遍的’精神来维护民族主义原则。抽象的民族主义原则可能并且有时确实存在,他们不把自己的民族性(nationality)看得过高,慷慨地向所有民族宣扬这种学说理论:让所有的民族都不要把异族纳入自己的政治居所。维护这种非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形式上的矛盾。”^④ 这表达了一种具有宽广胸怀的“四海为家”的国际主义原则。民族主义等同于国际主义。同一年,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① [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② [美]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④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试图理解民族所造成的深厚而强烈的个人归属感”^①,推出影响深远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将民族“想象为本质上有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他以深邃的视野阐述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的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③这段引文昭示两点:(1)“民族被认同于特定的领土,世界的某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他们民族的历史性家园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④;(2)“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总是不但要建立在对一个共同体和他们可以居住在一起的领土的想象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如何把不适合的人排除出去并划出边界的想象上”。^⑤换言之,民族=领土=家园=接纳与排他。1984年,米妮·布鲁斯·普莱特(Minnie Bruce Pratt)、艾妮·巴尔金(Elly Bulkin)、芭芭拉·史密斯(Balbara Smith)三人合作出版《你的身份在斗争中建构:针对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三种女

①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③ 同上书,第6—7页。

④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⑤ 同上。

性主义视角》(*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New York: Long Haul Press)一书,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角度对“家园”中潜在的权力化因素进行探讨,特别质疑了“经验”、“身份”、“政治化视角”三者之统一性。^①同一年,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概念历险记》(*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中通过讨论“怀旧和向往总体性”议题来研究“家园”:“‘总体性’确实已经在西方文化的话语里享受着优越地位。它同一些肯定性内涵相呼应,已经普遍地与其他充满积极意义的语词相联系,如连贯、秩序、任务、和谐、富庶、共识、共同体等。同时,它又与充满消极意义的概念相对比,如异化、碎片、无序、冲突、矛盾、系列化、雾化、疏离等”^②,并进一步指出:“现代是一个‘超验的无家可归’(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时期,人们居住在一个‘被上帝所摒弃’的世界——在这里,第一、第二天性……被不可改变地撕裂,人们将‘他们的自我塑造环境’看做牢笼而非充满母爱的温馨家园”。^③在这位理论家的眼里,家园等于“怀旧”、“向往总体性”和“无家可归”。1986年,印度裔美国批评家荷米·巴巴撰写的“播撒:时间、民族、叙事与现代民族的诸多边缘”(“Dissemination: Time, Nation, Narration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一文,召回詹姆逊的“民族寓言”观念,以发展自己的关于“移民者的隐喻性”(metaphoricity of the migrant)的论题^④,他指出,今天的现代民族被那些位居边缘化空间的人们在诸多边缘上书写着,他们是“被殖民者”、“妇女”、“迁徙者”、“外来移民”,等等;加之,来自主流市民中的边缘人士的

① Cf. Th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2.

②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21.

③ Ibid., p. 85.

④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5.

差异,拒绝读者强加的和谐——这些读者认为众多民族诞生于来自不同国度的共享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之中。^①同一年,康乃尔大学从事德语文学与女性研究的助理教授彼蒂·马丁(Biddy Martin)、女性研究机构研究员江德拉·特尔培德·莫哈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二人发表了“女性主义政治:家园与之何缘?”(“Feminist Politics: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之重要文献。她们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在1984年秋访问了我们在朗吉堡、弗吉尼亚、印度孟买的各自的‘家园’之后,随即开始进行这一项目——这些访问充满着冲突、缺失、记忆与欲望,我们均一致认为它们对于思考我们与女性主义政治之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在我们的个人历史、学术背景以及我们双方所经历的移居等诸多层面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我们所共享的政治化—智识性位置,促使我们可能一起撰写此篇论文。我们各自对米妮·布鲁斯·普莱特(Minnie Bruce Pratt)的半自传性叙事文本《身份:皮肤、血液、心脏》(*Identity: Skin Blood Heart*)的阅读,正好成为我们彻底思考和开发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观念的契机——这些观念一直缠绕着我们。我们对以下问题颇感兴趣:家园、身份、共同体之构型(configuration),……其作为概念、欲望的‘家园’的权力与感染力,其作为隐喻在女性主义书写中的出现,其在新右派修辞学(rhetoric of the New Right)中的挑战性在场”。^②阿德里安·弗蒂(Adrian Forty)也于同年推出另一部相关著作《欲望的对象:设计与社会 1750—1980》(*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他从讨论“对象的设计”入手来讨论“家园”问题。他首先指出:“我们所用的几乎每个对象物、我们所穿的大部分衣服、我们所吃的许多东西,均是一一被设计过的。由于设计似乎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有理由去追问‘它确实

①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6.

② Th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92.

是什么’、‘它设计什么’、‘它如何得以形成’之类的问题。……我的构想是,设计,在其经济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是一个超越人们的通常认可的具有更加重大意义的行动”。^① 然后,他明确论证道:“‘家园’既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又是一尊雕像。其容量的外观能够显示出‘家’是什么、打算促使人们在其中做什么。有关‘家园’的观念伴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伴随着时段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对于家园‘应该像什么、在哪里、何为得体、何为不得体’之类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关于在‘家园’中何为得体、何为美丽的构想已经形成了供家庭使用的商品的设计。这一关系也沿着其他方向发挥着作用:设计既符合趣味方面的通常看法,也能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对‘家园’有何思考、他们在其中应该如何做到举止得体”。^② 不难看出,“家园”在这里绝非中立之所,是被他人建构的,被他人设计的,负载着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1987年,英国学者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推出《地点与政治》(*Place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一书,系统讨论文化、权力、地点三者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他把地点理解为有三个维度:地方(locale)(从事某一行为的地点,比如国会或城市);位置(location)(置于广义社会关系中的地点,比如与国家政治或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位置)以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点的主观维度),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起理解,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关系都被理解为在特定的地点内产生的,都是由权力关系产生的。这里……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理解地点的方法,包括‘实践’、‘方案’、‘惯常的社会交往’、‘束缚’、‘结构’、‘时空路径’、‘茎节’等等”。^③ 南茜·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于同一时间推出专著《欲望与家庭小说:

① 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6, p. 6.

② Ibid., p. 94.

③ [美]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小说的政治化历史》(*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材料翔实,思考深刻,见解独特,是一部探讨“家庭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ng culture)和“家庭小说政治”(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ng fiction)的重要作品。阿姆斯特朗说:“‘家庭小说’从一开始就力图廓清‘性关系语言’与‘政治化语言’,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力图引入一种新的政治化权力形式。这一权力伴随着家庭妇女的出现而出现,并且通过她对所有那些对象与实践——我们将这些对象与实践同私人生活相联系——的控制,来确立权力对英国文化的控制。这样的妇女对家庭、休闲、求爱程序以及亲缘关系行使着权力,在她的管辖下,人类身份的一些最根本性特征得以展现。将家庭妇女的出现视作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正像它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样,并不意味着用措辞来展现矛盾,而是来发现构成现代文化的悖论。它也是用来追溯具体化的现代欲望形式的历史——在18世纪初期它改变了决定一个女性身上最重要的一切之标准。在无数的预计为女性而书写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说论文和小说文本中,这种欲望形式伴随着崭新类型的女性的出现而出现”。^① 这里,家庭—权力—欲望—女性四者被捆绑为一体,密不可分,是家园言说中的开创性突破。另外一位学者伽伦·凯普兰(Caren kaplan)也在1987年的《文化批评》第6期(春季号)上发表“解构领土划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的‘家园’改写与流亡”(“Deterritorializations: The Rewriting of Home and Exile in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一文。1988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中公开指出“英国人的历史就发生在海外”。^② 这暗指英国人的家园就在海外殖民中。1989年,杰尼弗·沃尔奇(Jennifer Wolch)、米歇尔·迪尔(Michael Dear)二人合作编辑《地形的

①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94.

② Salman Rushdie. *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 343.

权力:领土如何铸就社会生活》(*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Boston: Unwin, Hyman)一书,“特别关注社会生活建构领土之方法和领土建构社会生活之方法。这些过程之间的彼此依赖性——社会—空间辩证法——能确保这一点:一个人如不指涉他者,就不能遭致理解。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影响日常生活之社会实践的地形权力。我们认为,此类建基于领土之上的实践具有一种保护、坚持(即再造)社会关系的权力,而且还能超越这些关系,生产出重大的社会变化”。^① 这里实际强调了与“家园”相关的空间政治化问题,走向了学科的“文化地理学”,只是未深入涉及地点、意义、抵抗之间的复杂难解的纠葛而已。

1.3 20世纪90年代资源

1991年,英国学者多拉·哈瑞维(Donna Haraway)在著作《类人猿、赛博人和女性:人性的重新发明》(*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中将家园建构上的“搜寻的政治”界定为“能为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化界定和自我界定提供场所的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心灵深处的、想象性的疆界(boundaries)”。^② 因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招来杀身之祸而不得不隐居的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侨居英国多年,失去了纯粹的“印度性”,却又不能完全认同殖民立场。从13岁那年开始,他一直过着“候鸟般”的生活,身体不断“移位”,穿越印度、英国、巴基斯坦的国界,从孟买到伦敦再到卡拉奇,从东到西,处处有家,处处无“家园”。漂浮的、无根的、游移的生存状态意味着拉什迪别无选择,只能走进含混破碎的记忆深处,走进语言的乌托邦,用文字言说想象的家园。跨国界、跨文化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作家的身份错位意识和文化认同危机,让他在东西社会

① Jennifer Wolch Michael Dear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4.

②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Press, 1991, p. 196.